

听不见的是声音，能听见的是心跳

辽阳听障女孩凭一股“倔劲”考入厦大读博

本报记者于力、武江民

像被上帝拍掉了信号线，原本就模糊的、断断续续的声响在渐渐消失，跃动的世界变成一部默片，任凭自己歇斯底里地嘶吼，都是一片哑寂。

这是28岁的辽阳女孩赵袖竹随时面临的状况。4岁时被确诊为神经先天性耳聋后，她的人生似乎早已被“预言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任何一次感冒、流泪、剧烈运动都有可能夺去她那原本就微弱的听力。

她的成长，注定是一次和命运的赛跑。听不见的是声音，能听见的是心跳，她就在这微弱的声响中默默攀登，一路成长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，在无声的世界里奏响了人生的全新乐章。

在很多外人看来，她人生的“缺憾”似乎显而易见：秒针划过表盘的滴答声、大雨砸在玻璃上清脆的撞击声，吉他、钢琴在指尖奏响的音乐声……她注定与这一切失之交臂。

但对她自己来说，这世界已经足够丰富多彩。她常常戴上耳机，音乐会在她耳边留下带情绪的韵脚。她也喜欢在电影院看《长津湖》，即便只是“默片”，她也会不自觉地流泪。

或许正是这种“缺失”，让她更加懂得珍惜每一次感受、分享、成长的机会。她就像一朵无声的花，在一次又一次摇曳中绽放出属于她的人生光彩。

黑暗中的小孔

“像被锁进一间密不透风的小屋，到处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只有依靠右耳里的助听器，我才能在窗户上截出一方小孔来，看见一丝微弱的光。但这束光是脆弱的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随时都会被命运彻底堵上。”

赵袖竹说，自己左耳和右耳的听阈值分别在110分贝和90分贝左右，这在医学上已经被判定为“聋人”。但在她看来，“我和正常人是一样的，只是听力存在一点障碍。”每当说这话时，她的脸上总带着一股子倔强。

透过黑暗中的小孔，她对“听见”的渴望愈加强烈、炙热。

小时候，她会求母亲为她买来音乐磁带。当她戴上耳机时，柔美的声音会顺着耳蜗轻轻溜进来。尽管她根本听不清歌词，她听到的“音乐”，更接近于一段带节奏的噪音。但她就爱沉浸在这带有情绪的声音里，用心“倾听”世界的美妙。

有时候，她也会不自觉地哼唱起喜欢的歌曲，但母亲总说她的歌声像一段念白，缺少感情的起伏。她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只能下载能显示歌曲音律上下起伏的软件，比较自己的歌声与他人有什么不同。“确实不一样，那些节奏是我再怎么用力地发声，都无法模拟的。”

赵袖竹说，因为很多声音听不到、听不清，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，但她并不逃避，反而乐于挑战。

她会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，尽管每次开会时，她都很难通过读唇听清所有人的发言；她会骑单车在校园里穿行，只不过需要在拐弯时紧贴着路边的台阶，防止因为听不见而出现事故；她的手机永远设置为震动模式，有陌生人的电话时，她会说“喂”，然后假装信号不好，提醒对方发短信。

赵袖竹说，因为知道自己听不到，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时，她干脆放弃佩戴助听器。当别人听题时，她就一句句地翻译选项，根据前后的连贯性来进行选择。“大部分题猜不到联系，我就选正能量的，再不济就选最长的。”经过数次尝试后，她还是凭借阅读和作文的高分，如愿通过考试。

大学毕业后，赵袖竹曾参加过辽阳市当地的公务员考



厦门大学校园里的赵袖竹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试，笔试成绩优异的她，却在面试时卡了壳。

“当时他们坐得离我很远，我根本听不清问题，想申请文字提问时也遭到了拒绝。”赵袖竹说，为了应对这种尴尬，她侃侃而谈大学时学到的课本知识。尽管“驴唇不对马嘴”，她还是表现得很自信。“最后肯定没进，但也尝试过了。”

赵袖竹说，黑暗中的小孔是她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，哪怕再微弱，她都渴望通过这个小孔“倾听”世界的多样。

听见爱的回声

1997年，4岁的赵袖竹在北京被确诊为“神经先天性耳聋”后，第一次戴上助听器。被放大的噪音让她很不适应，一边大哭，一边想要挣脱“束缚”。她的母亲只能将她紧紧抱在怀里，父亲则在一旁红着眼，强忍着泪。返回辽阳的路上，父母怕饿着女儿，掏出最后的钱为她买了份热腾腾的水饺。

从此，母亲开始了“语言抢救计划”。“我当时就像疯了”一样，赶在她全聋之前，教她学会张口说话。”赵袖竹的母亲说，每天傍晚，她都会强迫4岁的赵袖竹站在镜子面前，把嘴张到最大，双手随着声音一开一合：“a……”。

即便戴着助听器，赵袖竹也很难听清母亲的声音，只能学着张大嘴，浑身用力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些声音“呃……”。

望着女儿，母亲心急又心疼，只能继续张大嘴，重复这个口型。每个拼音字母，都要数十遍、上百遍地教。上小学前，赵袖竹就学会了汉语拼音、千以内的珠算法和上百个生字。

赵袖竹第一次彻底失聪是在小学三年级。她和同学玩沙袋时，直挺挺地向后摔倒在地，剧烈的碰撞让她瞬间失去了微弱的听力。赵袖竹说，那种状态就像我们在噩梦中用尽全力想呼救，却发现怎么也发不出声音，只能陷入深深的恐

惧。失聪的同时，还伴随着剧烈的眩晕，让她恶心想吐。

打听到长春市有两家专门治疗神经性耳聋的医院后，他们一家人乘火车赶往长春。父亲回忆，那天的辽阳下着倾盆大雨，上车时，他一边撑伞一边抱着沉睡的女儿，在雨中狂奔。趁着大雨别人看不清，他憋了很久的眼泪在脸上纵横。“就是害怕，害怕这孩子真的完全失聪了。”

每次到长春治疗，都需要近半年的时间。父母要工作，不得已把赵袖竹一个人留在医院。为方便联系，他们在她手上绑了个手机，调成震动模式，每天给她发短信交流近况。父母的爱被赵袖竹深深看在眼里。小时候，晚上睡觉，她会悄悄用手指查看母亲的呼吸。确认母亲还在，她才会把被子捂紧，安静地睡去。每次母亲偷偷掩面哭泣时，她会走过去，轻轻擦干母亲眼角的泪，傻傻地冲她笑。

在爱中成长的她，总能敏锐捕捉到别人对她的善意与爱。赵袖竹说，上学时，同学们和她对话，总会有意无意地放慢速度，口型也会放大，方便她读懂。老师们也会尽力把知识点写在黑板上，下课后耐心回答她的问题……

在无声的世界里，这些爱让她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。“第一次和赵袖竹沟通时，其实并不是很顺利，她必须依靠翻译软件才能辨清我说的是什么。”赵袖竹的博士生导师李杨帆说，当时他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毕竟科研不仅仅是埋头苦学，也需要交流和分享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在研究生面试前和各位老师都进行了沟通，允许赵袖竹下台走到老师面前回答问题。

正式入学后，李杨帆也给了赵袖竹最大的关爱。开组会时，他会让赵袖竹坐到身边，可以面对分享者，读懂“唇语”。在遇到问题时，他也会不厌其烦地把图画出来给赵袖竹看，方便她理解。

不想着走了。”

贾士忙不敢告诉家里人自己大老远跑来哈尔滨，做的是抗疫志愿者。他怕家里人担心，尤其怕妈妈不理解。“7月去郑州抗洪，也是回来的时候才和家人说的。后来这么长时间待在哈尔滨，我就说我在这里打工，上夜班、运快递。”

7月，郑州暴雨。贾士忙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抢险现场的直播，从那时起，他产生了做志愿者的冲动。一转眼，这条路贾士忙已经走了近半年，有一件事让他感触很深。

那是在郑州抗洪的时候，一位同在前线支援的当地大姐看他一连坚持了十几天，自己主动掏出一把钥匙跟他说：“你还没走？我有个房子，你走路十分钟就能到，装修好的。”

贾士忙当时婉拒了。但那一把钥匙，他铭记至今；那一句滚烫的话，他也想用行动传递给别人。

半年间，有人支持、鼓励，也有人不理解，还有人说他这是“年轻人作秀”。但贾士忙不解释那么多，也不想那么多。正如他“朋友圈”里说的那样：“一个人，一个背包，一腔热血，撑到了现在。”

人说三十而立，得有自己的事业。但1991年出生的贾士忙说，自己还没顾上思考是不是要把做公益当成一份事业。“尽我自己所能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我也没想过要让多少人像我一样做志愿者，我只是能帮一个就帮一个。”

“我想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比起守护者，更像“接球员”

12月6日下午，李凯文的母亲把电话打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女儿：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过来？”

接通电话，母亲的手机听筒里传出嘈杂的背景声。不是菜市场的吆喝声，不是球场的喝彩声，而是数十人同时打电话的声音。

身在牡丹江市的母亲知道，李凯文在抗疫，在忙流调，要一天到晚和流调对象打电话，所以她不好打扰女儿的工作，之前跟她约定下班后没事时打个电话聊一聊。可从12月2日开始，女儿李凯文已“失联”4天。

迫不得已，母亲把电话打了过来。可没想到，才说了没两句话，李凯文就说“我还在忙”，匆匆挂了电话。

“有一次我们在外出差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李老师突然问我没有闹钟怎么起床。他是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。”赵袖竹说，她收到了太多来自或熟悉、或陌生人的爱，这些爱让她不得不努力，成为更好的人。

走向“大海深处”

从小到大，赵袖竹一共经历过四次彻底失聪。赵袖竹说，每一次失聪，都如同一次新生，让她学会坚强。

高二暑假，赵袖竹第三次“犯病”，又住进了长春的一家医院。“一想到十几年的学习都要白费，她就很焦虑。”妈妈回忆说。

直到高考前100多天，赵袖竹才正式出院回归复习状态。时间紧迫，母亲安慰她：“没事，上大专也没问题，实在不行就复读一年。”赵袖竹却憋着一股劲，坚定地说：“妈，相信我，我能行，我真的能行。”

回到学校的赵袖竹，坐在班级最后一排。为了赶进度，她每天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，从早到晚不断地刷题、做题。“从早上9点，一直到晚上，我都不停地刷，因为我覺得我不比别人差。或许我听不见老师讲课，但是我可以自己研究。”

经过上百个日夜的奋战，她如愿考入了东北农业大学水利工程专业。在大学中，她的成绩一直保持年级前列，屡屡获得奖学金和校级三好学生。

但好景不长，临近大四毕业，她再一次彻底失聪。她回到长春接受治疗，整整治了一年，才逐渐恢复。在治疗期间，她想过考事业单位、公务员，但都或多或少因为听力障碍，被阻挡在门外。

“我还是想考研。”下定决心后，赵袖竹买来考研的书籍，在3个月内完成了全部的复习，最终考回了东北农业大学。在研究生期间，她还连发6篇期刊论文，其中包括投在国际期刊《Water》上的两篇纯英文论文。

“我研究的是黑龙江省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土地和水资源的系统演化，以及从水利管理看黑龙江省粮食生产效率。”赵袖竹说，在研究生期间，她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方向，掌握了系统动力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。这也成为她敲开博士大门的一把钥匙。

“当时看中的就是她研究的系统动力学。”李杨帆说，虽然他的研究方向更侧重海洋管理，与赵袖竹的研究内容有所不同，但他还是鼓励赵袖竹通过系统动力学把两种研究对象结合起来。

进入厦门大学后，赵袖竹学习的劲头更足了。她查文献、寻找研究方向，每天在自习室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寝室。

赵袖竹说，她很喜欢凌晨一点的厦大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海洋气息。虽然听不到，但她可以看见骑行的外卖员，扶起单车的工作人员和实验室里依然亮着的灯。

李杨帆记得，博士生在二年级要做中期报告，确定、汇报研究方向。当时赵袖竹的研究方向还比较模糊，受到了在场专家的一些批评。但她并没有气馁，而是转头又钻进图书馆、实验室，开始按照要求修改。“几天后她交上来的报告很完整，是符合博士生要求的。”李杨帆说。

现在的赵袖竹，每天都沉浸在科研论文的写作中，她已经向多个核心期刊投稿。“我的研究论文方向是关于陆海统筹下，中国对海洋与海洋带的管理与规划。”

这位北方小城的听障女孩，正走向“大海深处”，开始自己新的探险。

（参与采写：于朗宁）

一座城的战“疫”，三个人的“长征”

本报记者陈聪、杨思琪、王鹤

夜幕还没来得及抹去落日余晖的这一刻，橙色的阳光微弱地打在胡宇鼓囊囊的防护服上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来到临时核酸采样点，蹦蹦跳跳地走到胡宇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哈尔滨的上空，太阳不动声色。夕阳下的这座冰城，正在紧张的战“疫”中焦灼地等待重归。

一个动作的千余次重复

快速挤出消毒液，搓手消毒，撕开包装袋，取出采样器，身体往前探，小心翼翼地咽拭子样本采集……这是哈尔滨市主城区开启的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现场。

在哈尔滨市香坊区一处临时核酸采样点，黑龙江省医院护理部护士胡宇熟练地进行着核酸检测的操作。

从早晨8点开始，整整12个小时。上面这样的动作，她一天要重复1100余次。这是本轮哈尔滨疫情中，胡宇和所有医务人员“长征”。

如果没有这一轮疫情，胡宇应该能每天回家陪伴她的三个女儿。她的大女儿今年12岁，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，今年8岁，在上二年级。

12月2日以来，哈尔滨市出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关联病例。截至7日24时，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35例。哈尔滨市升级防控举措，开展流调排查、隔离管控、核酸检测和病例救治等工作，全力阻断社区传播和疫情输出风险。

核酸检测的过程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，它涉及核酸采样、样本运送、实验室检测、结果报告4个环节。它检验的是一个城市从政府机关到街道社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同时也检验着医疗机构对核酸样本的检测能力。而对于胡宇来说，她的使命就是在接到通知的第一时间准备“迎战”。

在极寒天气下的哈尔滨，室内外温差高达30多摄氏度。而在临时核酸采样点，为保证室内空气流动，大门始终敞开，寒风一阵阵地吹进室内，室内外的温度相差无几。

时间一长，胡宇和同事们的手冻得发麻发胀。社区给他们准备了发热贴，她贴在手背上，可冷的感觉无法抑制地从

四面八方传过来。

胡宇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一线“火线”入党。在近几次黑龙江省疫情中，她已多次支援社区核酸检测。由于多是临时通知，她经常早上7点多出门，忙到夜里才回家。

12月4日这天也是如此。在接到核酸检测任务后，她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赶紧给家里老人打电话，让他们来家里照顾孩子。

几轮核酸检测下来，工作人员的疲惫感可想而知，但胡宇和同事们依然随时待命、随时“迎战”。

“只不过下次出任务，我得记得再多贴几个发热贴。”

河北来的志愿小哥，名字叫“忙”

12月4日，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滑雪场，“大白”们正忙碌着。从大门、前台，到衣柜、储物柜，凡是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地方，贾士忙和同事都一处不落地做了物体表面核酸样本采集。提起贾士忙的名字，哈尔滨市道外区疾控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都说他“很特别”。

故事要从今年9月底说起。

中秋节刚过，哈尔滨市巴彦县发生疫情，贾士忙正在老家河北辛集打零工。上网看到当地有招募志愿者的公告，他瞒着家人，坐着火车，一路跑来哈尔滨。

几个月过去，从巴彦疫情转战哈尔滨新一轮疫情，除了身上多了件道外区疾控中心提供的棉服，他仍然是一名不要任何酬劳的志愿者，住在疾控中心提供的宿舍，几乎身无分文。

一天采完多少管？他没有时间算。一天能睡几小时？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为什么是哈尔滨？吸引贾士忙的，只是偶然看到的一个招募志愿者的二维码。

“可能这边还没采完，下一个任务就来了，又要到新的地方去采，回头还要记在单子上。”打开他所说的单子，上面排列着样品编号、采样地点等各种信息，最左边一排条形码贴纸，就是贾士忙采集环境样本的足迹。这样的单子，他一天少说要填十来张，多的时候有二十来张。而他执行任务的地点，就是病例途经的重点场所。

“志愿者是可以随时随地就结束任务的，但是每天睁开眼就知道身边又有人因疫情隔离在家、不能来工作了，我就